



▲红军标语书法斗方“不革命的不分田地……”

▲红军标语书法斗方“国民党制造军阀，共产党打倒军阀”

▲红军标语书法条幅“拥护无产阶级……”

▲红军标语书法条幅“佃工要赶快起来消灭土豪……”

捐物的名录，多则数百十两，少则几钱，百余名族人共计捐银两千余两，按范文澜《中国通史》所引清朝档案，当时短工每天挣10文钱左右，最低每月130文钱，一两银子能换1000到1200文钱，以今日之工价衡量，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相当惊人，难怪在宗祠修建完成之后，捐项碑文里还要大大地加一笔，“谁云迁地弗良，舍旧从新，诚是有基弗弃，所赖以继前人之志，联合族之心，其在斯役也乎？”看来，还对几十年前袁遇春把宗祠建在湘潭城中耿耿于怀呢！

### 碑刻里的株洲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出自《左传·成公十三年》的这句话常常被后人引用，在古代，祭祀是为国家凝心聚力核心职能，因祭祀还随之衍生出宗族祠堂、族谱等产物，且一直保留至今。

天元区群丰镇石塘社区跃进居民组，一幢外墙粉饰一新的小楼格外引人瞩目，这里是石塘村小学的所在，在建成小学之前，这里是石塘山袁氏宗祠的旧址。明代，袁氏先祖袁某由茶陵徙居自此，开枝散叶，袁某也被后人尊称为石塘山袁氏的开基始祖。

虽然宗祠旧址已为新建的村小所取代，但石塘山袁氏宗祠的历史痕迹依然无所不在，譬如此地常住居民以袁姓居多，附近还有个地名就叫袁家湾，更重要的是，在学校里面，还保存着两块180年前的重修家庙捐项碑，碑上存留的文字，详细讲述了180年前，石塘山袁氏宗祠重建的前因后果。

### 三处宗祠

据碑文及现存的文献资料，石塘山袁氏宗祠至少有三处。一处是离现今村小不远的龙门古寺，唐宋时始建，为湖南最早的宗教禅宗寺院之一，明天顺年间，石塘山袁氏开基祖袁某（号扶桑公）自建威将军任上告老还乡，皇帝将龙门寺左近千余亩土地赐给他养老，信佛的袁某便将从军中认识的西藏喇嘛请回家乡弘传佛法，且重修龙门寺，并将自家宗祠建于寺内，所以，一段时期内，龙门寺亦称“袁氏家庙”；第二处则在旧时湘潭城中的湘山屋场，时在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建祠人是石塘山袁氏十世祖袁遇春，曾任江苏盱眙县丞、安徽凤阳县知县等职；第三处则是现在的石塘村小学所在，旧为袁氏宗祠，两块现藏于学校中的捐项碑则是明证。

按捐项碑上的文字所言，袁氏族人之所以要重修宗祠，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旧宗祠在去此数里之遥的湘潭城中，往来不便，且“地邻淤隘，均未惬意”；二是石塘山“祖宗始屯于斯，墓于斯”，所以应该“聚族于斯，而享祀亦于斯者也。”

那么，宗祠为什么又建在了几十里外的湘潭城中呢？也许该从石塘山袁氏十世祖袁遇春说起。查《石塘山袁氏六修族谱》，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袁遇春一家及近支族人十口自石塘山迁自湘潭城中的湘山屋场，搬迁的原因没有说明，估计是闹了某些别扭，因为就在二十五年后，湘潭城中的湘山屋场左近就修起了新的袁氏宗祠，主其事者，正是二十五年前搬离石塘山的袁遇春。

前已说过，石塘山袁氏的宗祠本在龙门寺内，自明天顺年间石塘山袁氏开基祖袁某将从军中结识的喇嘛请来龙门寺弘传佛法后，香火日趋旺盛，鼎盛时寺内有僧侣千人，逢佛门佳节，前来朝拜礼佛之人往往逾万。而族中宗祠便在这闹热的所在，袁氏后人往来祭祀先祖想来也颇多不便，只是今时不同往日，没有族中先祖袁某那般的地位和财力，虽然一直说要重修宗祠，可总是不了了之，直到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袁遇春在湘潭城中的湘山屋场再建石塘山袁氏宗祠。

按《石塘山袁氏六修族谱》所记，袁遇春，字资万，号锦堂，有举人功名，以县丞一职入仕，后来做到安徽凤阳县知县，且署理凤阳钞关。官不算大，但职权极重，清袭明制，设凤阳钞关征收商船税钞，“凡商贾欲货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卷”，为清代户部著名的二十四关之一。这样要害部门的主官，地位自不待言，阖族之中，也是说得上话的厉害角色，所以，将宗祠建在自家屋场左近，而不是族中先祖安寝的石塘山下，族中人虽有腹诽，也不便多说什么。

转眼到了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距袁遇春在湘潭城中新建宗祠已过去67年，袁遇春也作古多年，署理凤阳钞关所带来的政商影响力也渐渐消散，石塘山下的袁氏族人便动了将宗祠重建在石塘山的心思。

### 重修家庙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居于石塘山下的袁氏族人袁益山、袁桂庭、袁嘉宾、袁梦熊等人商议重修宗祠，且运动族人捐款捐物，尤值得一提的是袁益山，不但携自家兄弟捐银一百三十两，且“毁私管房屋数十间，捐作祠基”——按捐项碑碑文所记，居于石塘山的这一支族人早就想重修宗祠了，之所以未能落实，是因为族人看中的建宗祠之所“屋场未归画一，不能强而为之也”，换言之，产权不明晰，没有地，自然无从建祠，眼下好了，袁益山将本属于自家的屋场捐作祠基，最重要的用地问题解决了，这宗祠的建设也就可以提上议事日程了。

遗憾的是，由于史料阙如，我们这些180余年后的后人无从得知当年的袁益山是何等样的人物，但从其捐银一百三十两且毁去房屋数十间的举动来看，想必亦是族中举足轻重的权势人物。

有袁益山这样的榜样带头，宗祠修建的前期筹备工作进展很快，祠基不足之数，由各族人“捐之兑之”解决，建祠所需费用，则由族人“和衷集事，踊跃捐资”，同样在那两块捐项碑碑文中，记有袁氏族人捐资

### 宗祠今昔

不论什么时候，两千余两银子都算是一笔巨款，俗话说家宽出贤人、有钱好办事，更何况，除了有钱之外，还有袁益山等人捐出的祠基，以及阖族上下对几十年前祠堂建在距石塘山数十里之遥的湘潭城中的那股不服气的劲头儿。因此，石塘山袁氏新宗祠的修建工作推进得异常迅猛，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动议，次年即破土动工，再次年即告竣工。

许是财力雄厚的原因，这新建的石塘山袁氏宗祠额外的雄伟壮观。祠分三进，“后则为寝，以陈俎豆；中则其庭，以序昭穆；前建歌台，以奏管笙”，更有“左右长廊，房屋悉具；飞甍连砌，翼翼峨峨。”端的是气派！

也就能在新宗祠落成后的第五年，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石塘山袁氏族人袁芳瑛高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卒于松江府知府任上，官虽不大，名气却极大，工书善文不说，藏书之富更是“二百年所未有”；袁芳瑛以下，石塘山袁氏并有署理闽广南澳海防同知的袁震、候补同知直隶州的袁炳坤、曾任江苏江宁知县的袁国钧、民国初年曾任任国务院秘书和印铸局局长的袁思亮等杰出人物，晚清乱世，更是出了个大人物，即以“放牛娃”之身投效军旅，一步步成长为两广总督的袁树勋。

短短数十年，石塘山袁氏一族涌现出如此多的杰出人才，想必族人也会感慨祖宗的护佑之功，并对当年将宗祠修在祖宗的陵寝之地的决定无比认同吧！

正因为宗祠是祭祀祖宗的庄严场所，故族中后人对宗祠的管理也格外严格，还是在那两方捐项碑文中，便有“祠内理宜肃静，若借人起馆，必致损坏屋宇等件。公议同姓与异姓之师，均不得在祠起馆。其有棺材器物等项，亦不准寄放”之类的条款。

只是，再严苛的管理标准，也逃不过时光的淘洗，如今的石塘山袁氏宗祠早已不存，旧址之上，拔地而起的是现在的石塘村小学，所幸至今仍保存在学校里的两块刊于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的重修家庙捐项碑，碑上的文字依然能让我们得窥当年显赫一时的石塘山袁氏一族的种种，这也算是一种慰藉吧！



重修家庙捐项碑一 鲁新民拓印

# 重修家庙捐项碑 石塘山袁氏宗祠的建祠往事

郭亮

碑名：重修家庙捐项碑  
材质：大理石  
规制：（碑一）长120厘米、宽2厘米、厚2厘米  
（碑二）长100厘米、宽1厘米、厚2厘米  
年代：清  
现状：藏天元区群丰镇石塘村小学

## 炎陵红军标语的书法特征

黄建林

人们通常认为户外张贴的宣传标语，在书写上是粗制滥造的，谈不上什么书法不书法的，没有艺术价值可谈。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不管什么时代，人们手写的宣传标语，在书写上都有不少可圈可点的东西，或者说，有不少手写标语事实上就是精彩的“书法作品”。

近日，笔者参观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看到陈列在展厅的那些从乡间民居墙壁上揭裱下来的红军标语原件，除开标语的内容不说，单看它们的书写形式，就让我大为震惊！可以说，这个博物馆陈列的一百余幅红军标语，有相当一部分都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特征，是值得我们爱好书法艺术的人欣赏、学习和借鉴的。

先看书写形式。从书法的表现形式上看，炎陵的红军标语主要有斗方、条幅、横幅和对联等表现形式。例如：“不革命的不分田地……”“国民党制造军阀，共产党打倒军阀”，这是典型的书法斗方。这一类型的标语占绝大多数，约有60%。“韶县工农赶快起来消灭土豪……”“拥护无产阶级……”等是十分标准的书法条幅，占比例达到25%以上。“打到遂川去拥护全苏大会！”“要平等”“要自由”等算得上是极好的横幅，占红军标语的比例约有10%左右。“想当年剥削劳工工农利中生利好是好；至今日斩杀土豪劣绅刀上加刀痛不痛？”这就是对仗比较工整的对联了，而且还书写了横幅“阶级斗争”，这一类标语约占5%。

再看书写字体。因为宣传标语的特殊性，它要求让广大民众能够看得懂，认得清，草书、篆书等字体是肯定不能上墙的。炎陵的红军标语的书写字体，以行书、行楷为主，楷书中，间或还有隶书。如上文所举例子中，“国民党制造军阀”等就是很好的行书作品；“不革命的不分田地”“韶县工农赶快起来消灭土豪……”“拥护无产阶级……”等就是行楷作品；而“打到遂川去拥护全苏大会！”“要平等”“要自由”等则是较有章法的楷书作品；“想当年剥削劳工工农利中生利好是好；至今日斩杀土豪劣绅刀上加刀痛不痛？”这副对联又是极有特色的隶书作品。

三看字法、笔法、章法和用墨。我们来看“不革命的不分田地……”这幅标语斗方。全副标语正文88个字，落款13个字，属于较为典型的行楷书法字体。正文和落款的每一个字的每一个笔画都讲究来龙去脉；逆锋起笔，回锋收笔，中锋行笔的笔法特征十分突出。像第一行的“分”、第二行的“杀”“贫”“吏”与第三行的“反”、第八行的“焚”等字的捺笔，有比较浓重的颜体楷书意味。第四行的“共产党”与第七行的“共产党”重复出现，以及第一行、第五行、第九行重复出现的四个“不”字，书写时，还注意了笔法与结体上的变化。虽然这幅标语的每一个字的结体并不十分精致，但它的每一个字，甚至整幅字的布局、用墨的轻重，都值得我们用书法艺术的眼光去品味、去推敲。

再看“国民党制造军阀，共产党打倒军阀”这幅标语，可以说这是一幅非常有艺术水准的行书斗方作品。这幅标语的正文只有寥寥14个字，重复的字就有3个：“党”“军阀”，占总字数的近一半。这幅字乍一进入我们的视线，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击力，给人带来震撼性的美感享受。首先，它的布局十分抢眼、十分奇巧。14个字的正文，分布成4行，字数对比悬殊，字数多的两行，每行有5个字，少的仅有2个字，但是，整体布局却显得疏密有致——密处不能通风却不显得拥挤和压迫，疏处可以走马却不显得空荡与失衡。书写者通过字的大小、笔画的粗细来调整整幅字的空间布局。比如第一行“国民党制造”5个字，“国”字粗重，领起全幅，其他4个字则写得纤细、小巧；第三行“共产党打倒”5个字，又起伏有致，“共”“打”两字粗重，其他如“产”“党”“倒”3字则写得纤细。而第二、第四行的“军阀”两字重复，第二行的“军”字粗重，中竖长伸，占去第一行两个半字的空间，“阀”字则与第一行的“党”“制”等字基本上一样大小、粗重；而第四行的“军”字则只占第三行的一个半字空间，占第一行的两个字空间，“阀”字又略大于第三行的每一个字，比上面的“军”字短而宽，气势上则互相呼应。

其次，这幅字的用笔用墨十分有特色。用笔的轻重，用墨的浓淡燥润交错变换，形成了一种粗细交替、浓淡掩映的艺术效果。第一行“国”字、“制”字用重笔，出现浓墨，其他三个字则用轻笔，细线穿插其中；第二行“军”字重笔浓墨，“阀”字则轻笔细线，偶露枯笔峰。第三行“共”“打”粗重，“产”“党”“倒”三字又变成燥墨细行；第四行的“军”字略轻，与前一行的“共产”两字呼应，“阀”字和感叹号则粗重一如前三行的“打”“军”“国”等字。整幅字用笔、用墨做到了前呼后应，枯润交错，达到了波澜起伏、激情昂扬的艺术效果。而落款“红独一师二团”轻细简洁，干净利落，衬托了正文的磅礴气势。

再看隶书对联“想当年剥削劳工工农利中生利好是好；至今日斩杀土豪劣绅刀上加刀痛不痛？”虽然它的隶书“蚕头燕尾”作了较大变异，掺杂了一定的楷法意趣，但整幅对联的隶法仍十分浓厚。一是结字扁平方正，符合隶书结体规则；二是横、竖、撇、捺等笔画的写法具有十分突出的隶书笔法特征，如上联的“年”“剥”“削”“劳”“苦”“农”“工”“中”，下联的“至”“今”“日”“斩”“土”“绅”等字；三是相同的笔画在书写时注意讲求变化，如上联“剥”“削”“利”“好”等字的竖钩，写得既符合隶法，而又各各不一；有的圆转，有的顿折，有的笔势下倾，有的笔势上扬，有的则平正匀称，体现了书写者较深厚的隶书书写功底。而横批“阶级斗争”4个字，虽然语序采用现代汉语从左至右序列，但书法上却耐人寻味，与上下联一气呵成，配合起来显得沉稳凝重，棉里藏针，韵味无穷。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定，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留存于炎陵的红军标语，除了它们内容上的宣传教育作用之外，它们的书法艺术特征也是十分突出的，具有相当高的艺术鉴赏价值。

B4

株洲日报

22823906

2021年6月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赵卓  
校对：杨卓

# 神农城迹

SHENNONG CHENGJI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